

海洋社会学学科发展面临的挑战及其突破^{*}

陈 涛

(中国海洋大学 法政学院, 山东 青岛 266100)

摘 要: 作为一门新兴的社会学分支学科, 海洋社会学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科学共同体。而学科范畴的偏离和学科理论的匮乏已经成为制约学科发展的核心因素。关于学科范畴的偏离, 需要加强学科意识和学术研究的社会化。而学科理论建设需要科学共同体走出宏大叙事、走向田野、走向理论演绎。海洋开发提供了海洋社会学与主流社会学的对话平台, 其中, 海洋开发政策的自下而上考察、海洋开发中的生态破坏、低水平开发和石油泄漏提供了关键性的平台。海洋社会学重在研究海洋开发的社会机制、社会过程与社会后果, 同时需要关注文化因素。

关键词: 海洋社会学; 科学共同体; 学科范畴; 合法化; 海洋开发

中图分类号: B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35X(2012)02-0001-07

一、导言

作为社会学的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 海洋社会学近年来展现出了日益旺盛的生命力, 开始较为频繁地活跃于社会学的学术舞台上。海洋社会学在学科分类上属于应用社会学, 这门学科是应用一般社会学理论、范畴、方法等对海洋社会的人类行为及社会关系进行分析、研究。海洋社会学虽然有自己的理论框架, 但和理论社会学相比, 它没有自己完全独立的理论体系和方法, 而是沿用理论社会学的基本理论、范畴和方法, 针对自己独特领域进行研究。^[1]近年来的研究表明, 海洋社会学取得了较为积极的学术进展, 展现出了新兴的朝阳学科特征, 开始进入到主流社会学的视野中。正如学术界所指出的: “在新兴的分支社会学中, 海洋社会学理论研究势头迅猛、方兴未艾”。^[2]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 与其他分支社会学不同, 海洋社会学并不是由西方引进过来, 在西方社会学界也找不到有关这一学科内涵、研究对象及其理论的阐述。相反, 它是由我国学者首先提出, 并经由本土社会学者的建构而展现出学术生命力。在某种程度上, 在当前“西方压倒东风”的东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中, 这也给本土海洋社会学研究的“学术自信”构成了挑战。虽然西方社会学并未系统地倡导和研究海

洋社会学, 但是, 临近的研究是存在的。比如, 斯密斯(Estellie M. Smith)关于海洋人类学(Maritime Anthropology)的研究,^[3]社会学家弗洛伊登伯格(William R. Freudenburg)和格拉姆林(Robert Gramling)关于近海开发以及石油泄漏的研究, 有关于此, 笔者将在后续部分展开。此外, 诸如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等大学设有海洋人类学研究领域, 阿斯瓦尼(Shankar Aswani)^①等人类学家设有海洋人类学研究方向。笔者认为, 我们没有必要刻意与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有关海洋问题的研究接轨, 但开展有针对性的学术对话意义重大。

目前, 海洋社会学还属于初创阶段。^[4]在学科初创阶段, 海洋社会学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一是学科边界和学科体系模糊不清, 学科内在的逻辑体系有待梳理。比如, 关于渔村和渔民问题的研究, 海洋社会学与农村社会学难分彼此; 关于海洋环境问题的研究, 海洋社会学与环境社会学亦不可分割。虽然, 在现代社会, 学科交叉现象广泛存在, 社会学的其他分支学科也或多或少地存在这样的问题, 但对于一个刚刚兴起的学科发展而言, 如果学科边界过于模糊, 将是困扰学科发展的难题。二是尚未形成和主流社会学的对话机制。海洋社会学仍然游离

^{*} 收稿日期: 2012-01-0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海洋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与体系框架研究”(11BSH007)。

作者简介: 陈 涛(1983-), 男, 安徽霍邱人, 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讲师、博士, 主要从事环境社会学、海洋社会学和农村社会学研究。

① 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网站相关内容, <http://www.igpms.ucsb.edu/research/anthropology/anthropology.php>。

于传统社会学和主流社会学的边缘地带,也未能与主流社会学构成真正的学术对话。就目前所搜索到的文献而言,海洋社会学方面的著述主要集中在几所海洋大学之中。换言之,在中国社会学界的学术话语体系中,海洋社会学尚未“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第三,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海洋社会学学术成果鲜见。在主流或曰权威的社会学期刊,还没有发现海洋社会学方面的主题文章。与此同时,从社会学视角写作的海洋社会学著作和教材也十分有限。但从学科发展角度而言,这些还不是制约海洋社会学学科发展的核心问题。

制约海洋社会学发展的核心问题是研究中的学科范畴偏离和学科理论匮乏。这两大问题不解决,不但海洋社会学的“显学”地位无从谈起,就是海洋社会学的学科合法化(legitimation)亦将成为难题。而如果这两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将有助于其它问题得到迎刃而解。本文旨在对此问题进行研究,重点阐述的是处于初创阶段的海洋社会学学科发展及其合法化议题问题。在此基础上,笔者将梳理西方社会学有关海洋开发问题的相关研究,以期建立海洋社会学和主流社会学的对话平台。最后,就其他若干相关问题展开讨论。

二、制约学科合法化的根本问题

经过最近几年的发展,海洋社会学已经形成了库恩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他们由他们所受教育和见习训练中的共同因素结合在一起,他们自认为专门探索一些共同的目标,也包括培养自己的接班人。这种共同体具有这样一些特点:内部交流比较充分,专业方面的看法也比较一致。同一共同体成员很大程度上吸收同样的文献,引出类似的教训”。^{[5](P288-289)}这对于新兴学科的发展而言至关重要。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海洋社会学学科发展中还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其中,学科范畴的偏离和学科理论的匮乏是影响学科合法化进程的根本问题。

(一)学科范畴

“海洋社会学”一词最早由历史学家杨国桢^[6]提出。但在学科意义层面,杨国桢先生关于“海洋社会学”的阐述,是从“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而言的,并不具有“社会学”学科属性。最早从社会学视角研究“海洋社会学”的文献是庞玉珍的《海洋社会学:海洋问题的社会学阐释》一文。她指出,海洋社会学以人类的社会行为及其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海洋与社会的相互关系能否成为一种互动关系,是海洋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能否成立的基础。海洋世纪使海洋与

人类处于一种互动关系中,因此,改变了人类与海洋的关系,使海洋具有了显著的社会特征。^[1]随后,学术界展开了很多的理论争辩,其聚焦点是海洋社会学的学科内涵、学科体系、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以及理论建构。

但是,直到现在,海洋社会学尚未成为社会学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分支学科,也未能与主流社会学形成学术对话。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海洋社会学学术成果的参差不齐应当对此负有主要责任。具体而言,问题存在于两个方面。首先,具有社会学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并不占据多数,就目前所搜索到的文献而言,海洋社会学著述主要集中在几所海洋大学,海洋社会学的科学共同体是由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组成的,其中的社会学者数量比较有限。其次,缺少社会学的理论范式,甚至陷入了“社会学味道不浓”的尴尬境地。不少文献虽然冠以“海洋社会学”之名或者主题,但并不是社会学的学科视角,因而称之为“海洋社会学”并不贴切。这种问题必然导致海洋社会学在社会学界难以获得学术话语权。近年来,崔凤从学科发展角度多次撰文,直陈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呼吁加强学科意识。他指出,我们要强调海洋社会学的应用社会学的特性,强调运用社会学的理论、概念与方法对人类海洋实践活动进行描述与分析,这是海洋社会学发展的现实选择。^[4]同时,海洋社会学要有明确的学科意识,必须体现社会学的学科特性。只有明确的学科属性,海洋社会学才有立足之地。也只有这样,海洋社会学才可能融入主流社会学之中。^[7]这一呼吁的核心意义在于唤起科学共同体的学科意识。从某种意义而言,如果忽视了社会学的学科基础与理论范式,姑且不论海洋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及其社会影响,单就学科合法性而言,也将是严重的危机。

明确学科范畴有两个维度。一是科学共同体要明确学科意识,强化社会学基本原理的应用。海洋社会学者也在对学术圈内既有的学术观点进行审视,并提出了真知灼见。比如,宁波^[8]关于“海洋社会”这一概念的建设性批判非常具有学术价值。二是海洋社会学需要主动加强与主流社会学的对话。海洋社会学研究不能限于几所海洋大学,科学共同体可以“海洋开发”为平台,就其中的前瞻性议题与主流社会学展开学术对话,这一问题将在第三部分予以具体阐述。

(二)学科理论

海洋曾作为非领土(non-territory)而被建构,是一个抵制“发展”而难以掌控的空间。^{[9](P34)}而随着

海洋开发技术水平的进步,人类的涉海活动明显增强,和海洋经济学等其他海洋学科一样,海洋社会学也是在这种宏观背景下产生的。但是,海洋社会学至今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范式。“海洋世纪”和“海洋社会”一度为科学共同体所津津乐道,但是,“海洋世纪”并不是一个规范的学术用语,更不是一个社会学的专业术语。“海洋社会”具有明确的社会学学科指向,但是能否成立尚值得商榷。毕竟海洋社会中人群的共同地域仍主要是陆地,海洋社会还是陆地社会的一种延伸。^[8]而如果“海洋社会”难以构成,那么,“海洋社会管理”、“海洋社会控制”等次级命题的提法亦值得商榷。可见,在核心的学科概念层次上,海洋社会学尚存在不确定因素。

鉴于海洋社会学的学科发展态势,我们需要在三个层面进行方向性的转向。首先,走出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中。目前,海洋社会学主要停留于宏大叙事。现有的研究主要是从宏观层面论述海洋社会学的学科属性、研究内容以及发展方向,等等。这对于刚刚兴起、正处于建构中的一门学科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如果海洋社会学仅仅停留于宏大叙事,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发展。就现有的文献而言,近期的宏大叙事型的学术研究已经失去了早期的锐气和创新能力,已经鲜有创新性的学术观点。因此,海洋社会学亟待走出宏大叙事。其次,走向田野。理论不是臆想,理论的薄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验研究的严重滞后。海洋社会学可以围绕海洋发展展开深入的田野调查,形成扎实的研究报告和学术成果,进而建构海洋社会学的学科概念。当然,笔者需要澄清的是,海洋社会学的研究主题非常丰富,绝不仅仅是研究海洋开发。而是说,学科发展需要把握一些结构性的因素,在海洋社会学尚未成为“显学”的背景下,通过“海洋开发”这样的国家战略性重大前沿问题的深入研究,有助于其获得学术话语权。再次,走向理论归纳。海洋社会学应从“社会人假设”出发,围绕人类海洋开发行为开展大力的经验研究。^[10]但是,仅仅开展田野调查与个案研究是远远不够的,个案的累积也没有多少学术价值。问题的关键是在经验研究中理解特定议题中的社会意义(social meaning),深刻地认识社会,并提炼出具有解释力的学术概念与观点。这些学术观点与概念的演化、推理,则可以形成一定的理论体系。就学科发展而言,我们也能从环境社会学这个新兴学科的发展历程中获得可资比较的经验借鉴。中国环境社会学也尚未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但是,其影响力已经呈现出日渐上升的

趋势,已经得到了主流社会学的广泛认可。这不仅与我国环境问题的严峻态势和国家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议题契合,更重要的是,环境社会学家围绕诸如水污染、草原退化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田野调查,并提炼出了具有较大解释力的学术概念。海洋社会学在重视这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选择具有典型性的案例,即重视经验研究中的“选点”,建立追踪研究与回访研究的基础,为深入的理论研究奠定基础。

海洋社会学的理论建设需要“理论自觉”意识,需要增进学术自信。即:中国社会学需要的是对西方社会学的借鉴,并主要根据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实际,结合中国社会历史悠久的丰富传统学术资源,进行原创性的或有原创意义的理论创新,而不是在西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的笼子里跳舞,使自己的理论研究或经验研究成为西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的一个案列、一个验证。^[11]特别是,西方话语体系日盛,但往往并不能有效地解释中国社会。因此,海洋社会学的理论发展不能盲从西方的理论体系,也不要刻意套裁西方的理论范式,重点在于根据中国社会与区域文化的实际开展原创性的研究。

三、海洋社会学与主流社会学的对话平台

海洋开发战略的实施为海洋社会学的学科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时代契机。目前,研究影响海洋开发的因素以及海洋开发的后果已经在科学共同体内达成初步共识。但笔者需要强调的是,海洋社会学不同于海洋经济学等其他学科,更不能包揽一切,而是重在研究海洋开发的社会原因、社会过程与社会后果。同时,需要关注区域文化和地方性知识等因素。海洋开发政策的底层考察、海洋开发中的生态破坏、低水平开发与石油泄漏问题值得海洋社会学的特别关注。原因有三。一是这些议题可以发挥社会学的学科特色与专业优势,比如,自下而上地研究海洋开发政策及其实施绩效。二是这些问题正在进入主流社会学和其它分支社会学的学科视野,为海洋社会学与之对话提供了共同的话语体系。比如,海洋环境恶化也是环境社会学关注的重要内容。第三,西方社会学家在此已经有前瞻性的学术研究,在此可以开展中西方社会与文化的比较研究。对西方海洋开发中经验和教训的研究也可以为中国的海洋开发的科学实施提供具有可资比较价值的借鉴。

(一)海洋开发的底层考察

社会学的研究不同于经济学等其他学科,更加重视“自下而上”的视角,特别是,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学术研究更需要“从下往上看”。^{[12](P1)}正如斯科特所告诫的,忽视对底层社会和底层民众的洞察,那些旨

在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往往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13]海洋开发固然是推动经济发展,带动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的引擎,但是正视海洋开发中的诸种问题并形成预防机制,对于保证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更为重要。就学术研究而言,海洋社会学需要走出“应然”的价值判断,走向“实然”的事实调查与呈现,进而提出前瞻性的学术洞察。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海洋开发战略的科学实施。

尽管近海开发的历史悠久,但这种活动的社会评价研究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前后才出现。格拉姆林和布拉班特(Sarah Brabant)指出,这种海洋开发活动所需要的大量劳动力远远超出了当地的供给能力,从而引发了大量的外来人口迁入活动,进而带动了当地诸如房屋、医疗、学校、公共救助机构事业的发展,提高当地的税收,带动经济发展和新兴都市的兴起。^[14]所以,正常情况下特别是在官方的话语体系中,这样的发展项目在推广过程中应该会得到积极的支持。但是,弗洛伊登伯格和格拉姆林的研究发现,在一个地区(路易斯安那)取得成功的海洋开发项目,在另一个地区(北加州)竟然遭到了社区居民的强烈抵制。甚至,有关开发提案的项目听证会都遭到了数以千计的社区居民的袭击。这种反差具有深刻的社会机制,其中之一就是居民环境意识的提高。特别是,1969 年,圣巴巴巴拉石油泄漏事件将海洋开发中的环境问题客观地摆在了世人面前,影响了人们对类似项目的态度。^[15]类似的问题在中国也已经显现。比如,在海洋开发热潮中,沿海城市大力发展滨海旅游,建设人工岛,但不少项目因为缺少整体的规划,忽视了当地居民的利益或者缺少基本的公众参与,往往为当地居民所抵制,并引发社会冲突。比如,2011 年 1 月,海南文昌拟在清澜港的出口旁填海造起一座占地 300 多亩的人工岛,但遭到了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原来,填海会造成清澜港航道变窄,给出入清澜港的船只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而当地渔民的船只都比较小,出入则会更加危险。同时,由于当地人口较为密集,人均耕地较少,不少人都是靠出海捕鱼和在海边捕鱼捞虾来维持生计,如果在此处填海建起一座 300 多亩的人工岛,势必会影响当地村民的收入。而最让村民担心的,还是填海可能导致河流入海口变窄,水灾时会加剧周边村庄的受灾情况。此外,村民还担心填海会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所以,在有数百名警察维持

秩序的情况下,部分村民仍然越过警察设定的警戒线阻止施工,后来还砸坏了镇政府轿车。^②单纯官方话语体系下的“发展规划”在此难产,社会冲突与失序也因此而产生。

社会学的特长之一是学术批判,当然,这并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批判性的研究可以防范社会风险,预防可能的社会冲突,降低社会成本,进而有助于维系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目前,我国正掀起前所未有的海洋开发热潮,这对经济发展有重要价值。但片面的、短期的经济开发也存在很多的隐忧。地方老百姓在海洋开发实施过程中是否真的受益?那些利益受损群体的经济与社会补偿如何保障?部分村民为什么反对海洋开发?特别是,在已经有技术专家进行可行性论证的情况下,村民为什么还反对政府的海洋开发项目?这里面究竟有什么社会和文化难题?整体上看,这样的民间声音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虽然中国社会的发育特征决定了难以爆发诸如前述美国加州那样的反对情形,但是,一旦问题累积到一定程度,后果也将难以预料。最近几年的群体性事件已经在实践层面说明了这个问题,前述文昌案例也已经说明了海洋开发中忽视底层民众意见的严峻后果。通过对海洋开发政策自下而上的民间考察与研究,有助于政府部门及时发现问题,未雨绸缪,建立健全相应的预警机制。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海洋开发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仅仅是技术专家和工程专家的思维,同样需要社会学家参与到海洋开发项目的社会影响评价中。

(二)海洋开发中的生态破坏

自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实施海洋开发”战略部署以来,新一轮的海洋开发就开始如火如荼地开展。近年来,国务院颁布或批准通过了诸如《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等十多个规划,江苏、山东、浙江、辽宁等沿海省份的海洋开发纷纷上升为国家战略。但是,随着沿海开发强度的持续加大,对海岸带及近海海洋生态系统造成巨大的压力,全国海岸带及近岸海域生态系统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脆弱区。其中,高脆弱区占全国岸线总长度的 4.5%,中脆弱区占 32.0%,轻脆弱区占 46.7%,非脆弱区仅占 16.8%。^{[16](P385)}海洋开发活动是海洋生态环境压力的主要来源。陆续获批

②更详细的情况可参见雷诺:《文昌填海造岛遭村民反对 海洋局回应称合法》,人民网海南视窗,http://www.hkwb.net/news/content/2011-01/20/content_189698_4.htm,2011-1-20。

的沿海开发战略将带来新一轮的海洋和海岸带开发热潮,同时也会给业已脆弱的近岸海洋生态环境带来新的压力。^{[16](P337)}

海洋开发中的生态压力表现为多个方面,其中,以下两方面需要引起特别的重视。首先,重工业布局沿海化的趋势十分明显,给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增加了新压力。比如,《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提出的五个重点发展区域均分布在沿海,其中有四个以重化工工业为主导发展方向。^{[16](P336)}从宏观的时空视角而言,这具有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当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重化工产业的系统格局已经成型。由于重化工行业对“环境容量”需求大,往往分布于沿江、沿湖和沿海地区。而沿江和沿湖地区的生态压力已经很大,借助“海洋开发”这股春风,石油、钢铁等重化工产业纷纷向沿海集聚。即使这些重化工产业能全部达标排放,但也并不是“零排放”,势必给业已脆弱的海洋生态构成威胁。同时,那些在其它地方被关闭的重污染产业也往沿海转移。由此,海洋的生态压力和生态风险可见一斑。海洋社会学需要对重化工布局沿海化的社会机制、规律及其社会效应以及风险议题展开研究,为政府部门规避风险奠定基础。第二,所有的海洋开发规划均涉及海洋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问题,但各地区沿海发展规划对海洋和海岸带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有较大的差异。比如,《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重申了“加强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的要求,但并没有明确相应的规划任务。再比如,《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关于海洋污染防治方面仅仅再次强调了现有制度,但并没有提出针对北部湾实际情况的具体措施。^{[16](P336-337)}由此可见,暂且不论海洋开发战略实施中的“文本法”与“实践法”的分离,^[17]就是“文本法”本身亦未能得到应有的体现。这势必给环保不达标项目的上马以及企业违法排污行为提供制度漏洞,此时的环境保护恐已沦为“稻草人化”的境地。^[18]在这一议题中,海洋污染中所产生的受益圈(benefit zones)与受害圈(victimimized zones)的关系、^[19]人们遵守或者违反规范的行为的公开的或潜在的规律性的原则、^[20]受害群体的环境抗争逻辑以及由此所反映的中国社会与区域文化特征非常值得社会学家的深入研究。同时,这种研究也可架构海洋社会学与环境社会学等分支社会学交流的桥梁,将有助于推动海洋社会学的主流化进程。

海洋开发战略的实施目标不仅仅是海洋经济发展。比如,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中战略定位中,除了建设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现代海

洋产业集聚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海洋科技教育核心区、国家海洋经济改革开放先行区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建设全国重要的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战略目标的定位和目标的实现是两个不同的维度。从长期发展角度而言,“蓝色经济区”只是中介,最终目标是建设蓝色文明。但是,如果缺少严格的制度管制,海洋环境保护让位于片面的经济发展,那么,“蓝色文明”可能并未实现,“黑色经济区”已经形成。归根结底,这里的核心议题还是如何协调海洋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三)低水平开发与“吉登斯悖论”

在海岸带的开发利用和管理水平及其技术含量、自然资源有效开发利用程度,以及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受损程度等方面,中国沿海地区的发展与世界主要沿海国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16](P48)}我国的海洋开发不但存在无序问题,而且低水平、粗放型的海洋开发问题也十分突出。无论是在海洋专家的学术研究中还是在政府部门的工作报告中,这些问题都得到了很高的重视,但是,在实践层面,低水平开发问题依然十分严峻。在运作逻辑层面,这与气候变化中的“吉登斯悖论”(Giddens Paradox)颇为相似。

“吉登斯悖论”是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在“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中提出的。即气候变化问题尽管是一个结果非常严重的问题,而由于它在日常生活中不直接,因此,对大多数人而言,不被认为是重要的。“不管别人告诉我们威胁有多大,正视这些威胁总是很难的,因为它们让人感觉不是太真实——同时,生活还得照旧下去,生活的一切快乐和压力也得照旧下去。气候变化的政治学必须处理我所说的‘吉登斯悖论’。它表明,全球变暖带来的危险尽管看起来很可怕,但它们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可见的,因此许多人会袖手旁观,不会对它们有任何实际的举动。然而,坐等它们变得有形,变得严重,那时再去临时抱佛脚,定然是太迟了。^{[21](P2)}吉登斯指出,大多数公众认可全球变暖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但只有少数人愿意因此彻底地改变自己的生活。在精英当中,气候变化屈尊成了一种姿态政治——韬略听起来宏伟壮阔,但内容空洞。^{[21](P2)}在我们看来,“吉登斯悖论”适用于低水平开发问题,并且具有以下特征。首先,关于低水平开发,中央政府比地方政府的重视程度要高得多。但是,海洋开发主要由沿海地方政府具体实施和操作,因此,高层的文件和规范性要求往往并不能实现初衷。其次,文本规范(政府文件、法律法规)的重视与低水平开发的现实并存。即使是地方政府,关于提

高海洋开发水平的工作也可谓文山会海,但实施过程中并不乐观。归根结底,这还是地方政府的认识停留在暂时的经济效益层面所致。再次,即使在认识论层面具有前瞻性的思维,但对于大多数(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以及普通公众)而言,其行为都具有短期化的趋向。

十项全能建筑设计公司负责人克里斯托夫来博鳌参加北京奥运会游泳场馆设计竞标会时曾说:“海南不论怎么发展,都不要把这种和谐的自然风光破坏了。”他认为,发展一定要有计划,不能无节制地开发。西方国家在这方面已有太多的教训。比如,在希腊,许多小岛当初海水很蓝、鱼很多,但后来许多发展商到那里建别墅、建酒店,造成极大的污染和破坏,以至于现在要花很多人力物力去炸掉它们,重新恢复小岛的自然风光。^③但是,克里斯托夫的忠告并没有唤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在某种程度上,我国的海洋开发已经踏上了“生产的跑步机”(the treadmill of production)上,^[22]过度开发、无序开发不但具有某种特定的社会结构乃至政治因素,而且一旦踏上,就会形成惯性,短期内难以消除。海洋开发固然是带动国家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但我们也要深刻地认识到这种冲动的发展模式及其后果的严峻性。

(四)海洋开发中的石油泄漏

美国社会学家有关海洋开发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两项研究议题,即近海石油开发(offshore oil exploration)和近海天然气开发。近海开发可追溯到1897年,1953年之后,海上能源开采活动拓展到了外大陆架,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着。^[14]近海开发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海洋开发中也有很多风险,比如,海上开采和海上运输中的石油泄漏问题已经成为困扰国际社会的难题。

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管,过度的近海石油开发会引发海域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23]埃克森—瓦尔迪兹号(Exxon Valdez)溢油事件为例,说明了海上溢油与海洋开发中的政治体系紧密相关。^[24]石油泄漏是海洋污染的超级杀手,据统计,每年通过各种途径泄漏的海洋的石油和石油产品约占世界石油总产量的0.5%,其中,以油轮遇难造成的污染最为突出。^{[25](P91)}石油泄漏不仅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会直接污染海域,威胁到海洋生物的生存。同时,受污染的海产品则会通过食物链影响到人的健康。2010年5月,美国墨西哥湾石油泄漏事件再次将海上采油与海上石油运输的生态风险摆在了世人的面

前,并对我国海洋石油运输安全问题敲响了警钟。近年来,中国海洋开发活动中的溢油事件时有发生。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2011年的渤海溢油事件,溢油事件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生态破坏,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这一事件暴露了我国海洋溢油中的环评体制、应急处理机制、信息发布、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与执行等诸多层面的问题,也说明我们需要对既有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

除了从管理角度分析石油泄漏的责任体系之外,还需要从社会学角度分析特定的政治经济格局。作为社会学的分支学科,海洋社会学在此具有较大的解释力。

四、结论和讨论

海洋社会学虽然是新近产生的社会学分支学科,但已经呈现出朝阳学科的特征。从学科发展角度而言,海洋社会学需要坚持社会学的学科范畴,加强学科理论建设,这是影响到学科合法化进程的核心问题。

就学科发展而言,我们还可以从环境社会学的发展历程中汲取营养。环境社会学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诞生于美国,但其发展历程也不是一帆风顺,最初也受到主流社会学的质疑。弗洛伊登伯格梳理了环境社会学在学科发展的过程中的经验和遗产,其中有两点值得海洋社会学借鉴。一是使这一领域合法化(*legitimated the field*),即运用标准的社会学视角研究广泛的环境议题,最终使这环境社会学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二是欢迎批判,不断吸收多元的、不同的理论观点。^[26]关于第一个问题,即海洋社会学研究必须坚持社会学的学科范畴和理论范式,否则,学科合法化进程必然受阻。关于第二个问题,即海洋社会学需要开放学术空间,积极与主流社会学和其他分支社会学展开学术对话,对学术界的批判持欢迎的态势,兼容并包、广泛吸收社会学界的其它成果。

海洋开发为海洋社会学与主流社会学的学术对话提供了空间。其中,海洋社会学的研究重点是海洋开发的社会机制、社会过程以及社会后果,同时需要对相关文化因素以及地方性知识加强研究。坚持本土的学术研究路线,通过对海洋开发这样的国家战略议题的深入研究,海洋社会学能够取得积极的研究成果,海洋社会学家亦将成为促进海洋开发战略科学实施的中坚智囊。

^③艾吾海,《低水平开发 不如不开采》,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hn/1/16451.shtml,2004-9-5.

参考文献:

- [1] 庞玉珍. 海洋社会学:海洋问题的社会学阐述[J].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6): 133-136.
- [2] 杨敏, 郑杭生. 中国理论社会学研究: 进展回顾与趋势展望[J]. 思想战线, 2010, (6): 1-9.
- [3] Smith, E. M., Those Who Live from the Sea: A Study in Maritime Anthropology[M]. West Publishing Co., 1980.
- [4] 崔凤. 海洋社会学: 社会学应用研究的一项新探索[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6(8): 1-6.
- [5] 库恩. 范岱年、纪树立译. 必要的张力[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 [6] 杨国桢. 中国需要自己的海洋社会经济史[J]. 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6, (2): 107-110.
- [7] 崔凤. 海洋社会学与主流社会学研究[J].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2): 29-32.
- [8] 宁波. 关于海洋社会与海洋社会学概念的讨论[J].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4): 18-21.
- [9] Steinberg, P. E.,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e Ocea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10] 崔凤. 再论海洋社会学的学科属性[J].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1): 15-17.
- [11] 郑杭生. 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J]. 江苏社会科学, 2009, (5): 1-7.
- [12] 曹锦清. 黄河边的中国[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0.
- [13] Scott, J. C.,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M].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14] Gramling, R. & Brabant, S., "Boom Towns and Offshore Energy Impact Assessment: The Development of a Comprehensive Model",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1986, 29(2): 177-201.
- [15] Freudenburg, W. R. & Gramling, R., "Socio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Development Policy: Understanding Opposition and Support for Offshore Oil Development", Sociological Forum 1993, 8(3): 341-364.
- [16] 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课题组. 中国海洋发展报告(2010)[M]. 北京: 海洋出版社, 2010.
- [17] 陈阿江. 次生焦虑——太湖流域水污染的社会解读[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 [18] 陈涛, 左茜. "稻草人化"与"去稻草人化"——中国地方环保部门的角色式微及其矫正策略[J]. 中州学刊, 2010, (4): 110-114.
- [19] Funabashi, H. "Minamata Disease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Japanese Sociology 2006, 15 (1): 7-25.
- [20] 朱力. 遵守规范为什么十分困难?——关于规范与失范的理论命题探讨[J]. 学海, 2010, (5): 86-91.
- [21] 吉登斯. 曹荣湘译. 气候变化的政治[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 [22] Gould, K. A., Pellow, D. N. & Schnaiberg, A., the Treadmill of Production [M]. Boulder: Paradigm Publishers, 2008.
- [23] Freudenburg, W. R. & Gramling, R., Oil in Troubled Waters: Perceptions, Politics and the Battle over Offshore Drilling [M].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4.
- [24] Gramling, R. & Freudenburg, W. R., "The Exxon Valdez Oil Spill in the Context of U. S. Petroleum Energy Politics", Organization & Environment 1992, 6(3): 175-196.
- [25] 张开诚等. 海洋社会学概论[M]. 北京: 海洋出版社, 2010.
- [26] Freudenburg, W. R., "Thirty Years of Scholarship and Science on Environmental Society Relationships", Organization & Environment 2008, 21(4): 449-459.

The Challenge and Breakthrough Facing the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of Marine Sociology

Chen Tao

(School of Law & Political Science,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Abstract: As an emerging branch of sociological subject, marine sociology has already formed its own scientific community. However, the deviation of sociological category and deficiency of disciplinary theory have been restricting its development. Enhancement of disciplinary consciousness and sociologicalization are needed to correct the deviation. For disciplinary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needs to remove grand narrative, move towards field study and theoretical deduction. Marine development, which includes nongovernmental attitude, ecological damage, low-level development and oil spill, provides a platform for a dialogue between marine sociology and main sociology. Marine sociology focuses on the relevant cultural factors as well as the social mechanisms, processes and consequences of marine development.

Key words: marine sociology; scientific community; sociological category; legitimation; marine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 也 夫